

關懷與祝福

——董保中教授訪問記

朱榮智

董保中教授，四川人。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畢業，加州柏克萊大學歷史碩士，加州柯萊蒙研究院博士，主修中國現代文學，現任教水牛城紐約州立大學。本學年為臺大外文系客座教授。

董保中先生最近把他這些年來發表的十六篇論文，交給爾雅出版社出版，書名是「文學、政治、自由」。這是一本討論文學問題的論著，特別是於文學與政治、文學的創作自由、以及國內當前的文藝問題等方面，有很深刻而且精闢的立論，是一本很有份量的好書。記得去年九月中旬，知悉董教授對以抗戰為背景的文學作品很有興趣，正巧去年七月號「幼獅文藝」「抗戰四十周年紀念專輯」裏，有一篇鄭明嫻女士寫的「不屈的中國魂」，介紹十本以抗戰為背景的小說，我於是有機會去拜訪董教授。之後，因為編務的關係，我們又有幾次的連繫，但是每次都由於時間倉促，不能很愉快的閒敘。最近，知道他不久就要返回美國，於是特別請他安排時間，允許我做一次深入的訪問。

與侯健教授的文學論辯

在董教授「文學、政治、自由」一書的自序裏，他提到因為在「中外文學」發表「文藝批評家與作家」一文，引起與臺大外文系主任侯健教授的一場論辯，使他得以被邀請到臺灣來擔任一年的客座教授。因此，我首次先請他談一談論辯的經過。董教授說：

我跟侯健教授論辯的情形，並不很複雜。當時，我正在國外，常常看到一些文章，討論文藝批評家的態度，認為作家應該寫些什麼內容？以及如何寫的問題，換句話說，就是要求作家達到文藝批評家想像中的目的。而我覺得，一個作家應該有他的獨立自由，文藝批評家應該在題材的選擇上，尊重作家的自由。文藝批評家的責任，是等到作家把作品寫出來之後，加以品評，以幫助讀者了解作品中的意義，而不是在創作之前，就預先告訴作家應該寫些什麼內容。

侯先生則擔心作家如果有太多的自由，則會濫用自由。在他答覆我的文章——「作家、批評家與文學的程途」（也在「中外文學」發表）

一文中，即認為作家如果沒有批評家的監督，就會濫用自由。

我當時並沒有想到作家會不會濫用自由的問題，因為我在談論文藝批評家與作家的關係時，只就嚴肅的作家和嚴肅的作品而言，對於不是「文學」，而只以文藝形式發表的一些「黃」的或「黑」的、不值一評的東西，在時間上、精力上，都是不值得文藝批評家來分析研究。我所強調的是希望批評家少給作家出作文題目。

第一次接觸國內的文藝刊物

由於職業的習慣，董教授說完之後，我很好奇地問他在「中外文學」發表的那篇文章，是約來的呢？還是自己投寄的？董教授回答說：是自己寄來的。於是，我想進一步了解他在美國接觸臺灣的文藝刊物的情形。董教授說：

這是我第三次的回國。第一次是民國六一年參加第一屆海外學人國家建設研究會，第二次是民國六五年參加第五屆中美大陸問題會議。但是前兩次停留的時間都很短暫，前後不到一個

月。

「中外文學」是我在這一次返國的一年多以前才知道的。我第一次接觸到的國內文藝刊物是「幼獅文藝」。

六年前，我第一次回國參加海外學人國家建設研究會時，我看到了「幼獅文藝」，回去之後，他們又寄了幾本給我。這份雜誌給我的印象，是出乎意料的好，因為最初我以為只要是政府辦的刊物，就都是宣傳品，可是我看「幼獅文藝」裏面所發表的文章，幅度非常廣泛，不但有國內作家的作品，而且對於西方的文學與藝術，也有很多的介紹。所以從那個時候，就使我開始對國內的文壇產生濃厚的興趣。

當然，我也看過「純文學」。我的第一篇中文寫作——「中共反修正主義戲劇中的現實」，便是發表在一九六九年七月號的「純文學」。不過，不久「純文學」便停刊了，十分可惜。林海音女士用了我那篇稿子之後，又要我寫一篇西方的裸體戲劇。我在這方面涉獵很多，買書回來之後，覺得沒有什麼值得寫的，而且

寫裸體戲劇出了名，反而不太好，所以我就不願意寫。這已是十年以前的事了。

專攻戲劇與現代文學

董教授目前正在臺大外文系開戲劇課程。談到學術研究的興趣，他說：

我對戲劇方面的興趣，重點是在西洋戲劇和現代中國戲劇。這當然與我在美國教中國現代文學有關，另外，也是受夏濟安先生的影響。因為有一次，夏濟安先生參加一項國際性的現代中國文學會議（一九六二年），討論中共的文學。夏先生認為田漢是現代中國戲劇方面很重要的作家，可惜沒有人做過他的研究，於是建議我在這方面做些工作。因此，我開始對現代中國戲劇，特別是中共的戲劇，產生興趣。除了戲劇方面，在文學批評和文學史，特別是文學與政治、社會的關係，我也有很濃厚的興趣。

出書與寫作

去年，董教授剛回國不久，國內許多報紙、雜誌，都爭相約他寫文章，所以除了交給爾雅出版社出版

「文學・政治・自由」一書外，最近，中華日報副刊主編蔡文甫先生負責的九歌出版社，也準備把他在幾個報紙副刊發表的比較輕鬆的文章出版印行，書名暫定為「蒙古烤肉、芭蕾舞」，足以代表這一年他在臺灣的所見所聞。

董教授自稱，他有機會認識國內許多報紙和雜誌的編輯，也是很偶然的事。那是在民國六十五年回來參加中美大陸問題會議時，因與夏志清先生同行，朋友請夏志清先生吃飯，他也常在被邀之列，大家就這麼認識了。而他的文章，也就一篇一篇被「鼓勵」出來。

除了收入即將出書的文章外，董教授這一年也寫了不少關於文藝理論的文章，他並計劃將來回到美國之後，再多寫幾篇分析臺灣的作家的作品的評論文字。在美國似乎比較可以清靜的寫文章，而分析作品的文章，一般來說，也比較難寫，因為每一篇小說都自成一個世界。

文藝論戰

從某一觀點來說，董教授這一年在國內的文壇，佔有一席重要的地位。因為，繼姚朋先生「不談人性

何有文學」、余光中先生「狼來了」二文之後，董教授也先後發表幾篇文章，討論「鄉土文學」的問題，如「金水嬌與金水嬌批評」、「談工農兵文藝」、「我們當前的一些文藝問題」等。

這幾篇文章，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和爭論，為此，他也挨了不少的罵，被夏潮及中華雜誌等刊物，指為「聯經集團兩報一刊文學部隊的七武士」之一，又說他是「最陰狠、最不講道理和道德的人。」談到這裏，他說：

「挨罵」！的確是挨了罵。我們應該想法子學習，把這個「罵」字取消，因為「罵」是很情緒化，而且意氣用事的，這是我們文藝界很不好的習慣。以罵來對付人，表示這個人說理說不清楚。罵我的人，最常引用我在「金水嬌與金水嬌批評」的一段話：「看見窮人就同情，就如看見有錢人就恨一樣的，是無原則的。」這是用階級的劃分法，說我是有錢階級，而不同情窮人階級。我覺得這是有意的歪曲。無意的「歪曲」還可以原諒，有意的歪曲則不可原諒。

因爲在「金水嬌」裏有兩個窮人，一個是金水嬌，一個是金水。王拓在他的小說裏，說金水是個好吃懶作的人，而金水嬌則是個勤奮的人；那麼，金水當然不值得我們同情，而金水嬌值得我們同情，則是因爲她的道德力量，她在努力的工作。所以，這並不是我不同情窮人，而是看他爲什麼窮。因此，批評我的人的這種歪曲是不應該的。我對整個「鄉土文學」問題的看法，並不反對「鄉土派」作家的作品，我還是很欣賞王拓的（這從「金水嬌與金水嬌批評」一文可以看出）我反對的是他們的批評態度。

這次的論戰，其實不是文藝的論戰，而是利用文學的形式，來表達對政治和社會的認識，是一種政治與社會的活動，而藉文學來發展而已；所以，在我寫的「談工農兵文藝」等文章裏，提出我個人對他們的看法。但是所得到的迴響，不是他們對我所提出的問題的看法，而說我是給他們戴「帽子」。其實，是他們在給我戴「帽子」。

我以爲真正對許多知識份子的文藝觀、社會、政治態度，具有影響力量的，不是文藝作品的本身，而是那些論說偏激，直接利用某種政治觀、意識形態來解釋文藝，利用文藝論辯的形式來宣傳非文藝性的政治觀念的論戰文字。

提倡創作自由

在談話中，我提到許多人認爲目前國內的文壇，似乎對作品的要求太多，而真正的作品却很缺乏。董教授認爲，好的作品太少，原因當然很多，其中之一是批評家要求過嚴。批評家要求過嚴，則使作者不敢寫，因爲怕寫出來的作品，不能符合批評家的要求。由於不知怎麼寫，乾脆就不寫了。所以，鼓勵創作自由，應是提倡好的文學作品的條件之一。

董教授認爲，有些人過份強調文學的社會性，要求作品反映現實中不幸的層面，要對貧窮人民的特別關心，這是很不正確的看法。他說：

對不幸的人的同情，這是人性的自然表現。但是並不應該要求所有的作家，只寫這種作品。文學的功用，在於反映人生，而人生是很複雜的，貧困只是其中的一種，不應該把文學局限

在某一個特定的範圍。

作品的影響

文學作品對人生的影響很大，好的作品，可以鼓舞人心，提昇人生的精神境界，而不好的作品，却會教人變壞，產生不良的影響。而在今天出版業很發達的社會裏，往往有許多粗製濫造、趣味低級的文字也被出版，而且竟受歡迎。談到這裏，董教授說：

關於作品的影響，好的文學作品，直接的影響並不顯著，常常要看了很多，而且很久以後，才能發現它的好處；但是，壞的作品，影響力很大，也很顯著。因此，建立良好的批評制度，是很重要的工作。

不過，好的書看的人少，這是不可避免的現象。欣賞力高的人，永遠比較少，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。藝術的價值，不能以量而定，一般而言，通俗性的書，總是比較受歡迎。當然，暢銷的書，並不一定都是壞書。

對國內文壇的建議

談及國內的文壇，董教授有很殷切的寄望。他

說：

第一：目前，國內的文壇有很多不同的派別，

大家應該互相包容，不必彼此當成敵人。套一句孔子說的話，就是「君子和而不同」。有不同的文藝思想及派別，這是一個好的現象；若是一個社會只有一種文藝理論、一種文學創作，則是非常糟糕的事。第二：大家要「能辯論而不要吵，能批評而不要罵。」我覺得這是一個基本的態度。批評與辯論，是一種積極性的；而吵與罵，則是毀滅性的。如果把毀滅性的「吵與罵」去掉，則可增加彼此的了解。了解並不是同意，但是了解之後，可以免除誤會。換言之，一方面我們要容忍別人，一方面自己要謙虛一點，不要太主觀，認為自己的觀點一定是對的，而別人的看法就錯了。

向國際文壇進軍

談到國內的作家，我問董教授是否會對臺灣有這麼多的作家和如此豐富的作品，感到驚訝或意外？他

說：

不！並沒有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我回國以前，是已想像到會有很多東西，只是不知道到底會

有那些東西？我這一次回來，則開始知道有些什麼作家和作品。當然，我這一年的收穫是多方面的，研究國內的作家及作品，也是我此行的目的之一，我計劃回到美國以後，邀集一些同行的學者，有系統地介紹在臺灣的作家的作品。我相信，臺灣在國際上受到尊敬與否，將有很大部份是看我們的作家、藝術家的具體表現。

以目前情形來說，國際文壇對臺灣的作家的注意，仍嫌太少。大概在三、四年前，夏志清、劉紹銘教授才開始介紹國內現代作家的作品，榮之穎教授也曾經翻譯過一本中國現代詩集，但是銷路並不好。現在一般國際學者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注意，很多是受政治的影響，他們是希望透過中共的文學來了解中國大陸，他們不是把文學當作一門藝術的創作，而是一種政治、社會研究的資料；而臺灣的文壇常是被忽略的。

事實上，臺灣的文學，確是比中共的文學豐富

太多，不只是量的方面如此，而且從水準與內容來看，也是多采多姿。所以，向國際文壇進軍，是我們當前必須的努力。

努力之道，可從兩方面着手：一是翻譯國內的優秀作品，增加外國人士接觸的機會。譬如陳若曦的小說英譯，現在已經完成，預計今年六月在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出版，「紐約時報」有很好的批評。二是要靠有英文寫作能力的人，多做一些介紹的工作。

結語

我和董教授雖然只有數面之緣，但是他的平和、儒雅的風度，一直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我從董教授的家辭別回來，已是黃昏時候；天上拋着霏霏的細雨，我漫步在基隆路三段的人行道上，一路想着董教授鏗鏘有力的話：

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雖然頗受挫折，而國內作家在創作上的努力，將使我國在國際文壇上得到尊重和禮遇。